

流动中的身份跃迁

——基于五城市流动人口调查实证

齐嘉楠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利用2009年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试点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在首次流动与本次流动期间的身份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描述了当前流动人口的身份跃迁状态。研究发现“不流动”的流动人口比例仍偏大,居留长久化、首次流动时年龄年轻化有利于向上跃迁。当前的户籍制度、教育程度、婚姻与性别等因素都对身份的跃迁起着重要作用,而民族属性对身份跃迁影响不大。

关键词: 流动人口; 身份跃迁; 多元逻辑斯蒂回归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2) 06-0053-06

The Changing Status of Migrant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Migrant Survey Carried out in Five Cities

QI Jia-na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migration survey carried out in five cities organized by NPFPC, this paper tak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status changing of migrat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current migration, and gives an picture of changing status of migrates nowaday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Don’t move” is the biggest subpopulation, and staying in the city more time and migrates in one’s early age will improve one’s mobility rates. There are other key factors to the social mobility,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er, education, matrimony and sexuality, but not the ethnic.

Keywords: migrants; changing status;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11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3亿。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日益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目前我国进入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进行的阶段,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加速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流动人口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通过自身

收稿日期: 2012-07-12; 修订日期: 2012-09-17

作者简介: 齐嘉楠(1979-),河北石家庄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 抽样方法与调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

努力也在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境遇和地位。社会对流动人口改善身份地位诉求的回应,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开放与文明程度。

关于社会的流动程度,专家们看法各不相同。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社会呈现出“阶层边界”封闭性强化的趋势,而这种趋势无论是在稳定社会还是在变迁社会中,无论是在主导阶层还是在边缘阶层中都普遍存在着;现阶段促进边缘群体突破“阶层边界”实现质的向上流动的力量有明显弱化的趋势^[1]。有专家认为,目前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性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而教育资本与政治资本作为后致性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中国社会正渐进走向开放型社会^[2]。

无论社会的开放与否,流动人口作为事实上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先天弱势处境的故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振奋人心的实践之一。有专家通过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大多仍处于水平流动,只有破除了若干障碍,才有可能出现好的向上跃迁^[3]。也有专家认为,家庭出身背景、人力资本投资、工作资历的积累、受雇于好单位等因素,并不是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跃迁的最重要因素,更重要的可能是社会网络、机遇、冒险、大胆、钻制度的空子等非常规因素^[4]。

本文对流动人口在流动中变换就业身份的情况进行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当前社会的开放和流动程度。流动人口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其内部的流动性是高是低还是稳定?哪些人更容易通过变换就业身份跃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婚姻对男女身份跃迁的影响一致吗?教育是身份跃升的“推进剂”还是延阻身份向下跃迁的“刹车闸”?民族属性对身份跃迁有没有影响?希望这些问题能在本研究中获得部分的解答。

二、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组织的“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调查”。该调查采取重点抽样和多阶段PPS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区域为北京、上海、深圳、太原、成都这5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在每个城市内部以流动人口规模为抽样标志选取40个乡镇街道、80个行政村(居)委会同时开展调查。最终获得21771户流动人口家庭样本,其中涉及46461个流动人口的有效信息;共有30923个流动人口接受个人问卷调查。

本文利用了“重点地区流动人口监测调查”中关于流动经历部分的“首次流动时就业身份”与“本次流动时就业身份”作为身份跃迁的起点和终点。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不同,就业身份划分为雇主、自营劳动者(含家庭帮工)、雇员和未工作者群体四个等级,并将未工作者归为最低等级。进入本文分析的样本为5980人,通过对抽样比和无回答率进行加权,最终样本为5943人。其中,男性占55.3%,女性占44.7%;15~24岁占16.7%,25~29岁占24.0%,30~34岁占22.7%,35~39岁占20.8%,40~59岁占15.8%;未婚占15.6%,已婚占84.4%;汉族占96.6%,其他民族占3.4%;农业户口占82.7%,非农业户口占17.3%;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11.8%,初中占54.2%,高中或中专占24.0%,大专及以上占10.0%。

三、数据分析

在本文的研究中,根据就业身份的不同将流动人口划分为四个群体:雇主、自雇劳动者、雇员和未工作者群体,四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由高及低排列。将首次流动与本次流动时所处群体不变者定义为“不跃迁”,将首次流动时所在群体高于本次流动时所在群体的流动定义为“向下跃迁”,将首次流动时所在群体低于本次流动时所在群体的流动定义为“向上跃迁”。

1. 身份跃迁的方向

流动人口的跃迁总体呈现出“不流动性”,不流动率为63.3%,向上跃迁率为23.6%,向下跃迁率为13.1%。向上跃迁率高于向下跃迁率,说明通过流动,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确有提高,但与不流动率相比,又显得上升乏力。大部分流动人口被局限在一个平台内,欲上不能,但其下降的概率也

同样不高（见表1）。

流动人口首次流动前，有 63.7% 的人务农或正在读书，如果将这一阶段视为身份跃迁的起点，那么流动人口的身份跃迁率将会提高，但从农业职业或学生身份转换为非农职业，更多是由于地域时空的变换，并不能反映出流动人口流动后通过自身努力克服阻碍获得社会地位变化的现实，因此，本文选择首次流动时的就业身份作为身份跃迁的起点。

2. 各影响因素与身份跃迁

表2展示了流动人口身份跃迁影响因素的作用情况。

农业流动人口较非农业流动人口社会地位更不容易提升，而更容易出现下降。前者的向上跃迁率为 22.8%，后者为 27.4%；前者的向下跃迁率为 13.3%，后者为 12.1%。

性别在身份跃迁的变化中差异明显，男性较女性更具优势。男性向上跃迁率为 27.1%，女性仅为 19.2%；男性向下跃迁率为 5.0%，女性为 23.1%，女性向下跃迁率比男性高 18.1%。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女性向下跃迁率较高部分是由于女性在流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转换造成的。首次流动时，女性就业比例虽然低于男性，前者为 82.2%，后者为 90.3%，两者之间差距并不大，只有少数女性在操持家务，比例为 7.1%。然而到本次流动时，女性就业比例大大低于男性，前者下降到 66.7%，后者上升为 94.9%，两者差距拉大，女性在操持家务的比例上升到 25.0%。

汉族较其他民族在向上跃迁时有一定优势，但差距不大，两者的社会不流动率以及向下跃迁率基本类似。汉族的向上跃迁率为 23.7%，其他民族为 21.2%；汉族的向下跃迁率为 13.1%，其他民族为 13.8%；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不流动率基本一致，前者为 63.3%，后者为 65.0%。

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向上跃迁率最高，为 26.5%，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向上跃迁率最低，为 20.9%；受教育程度为高中或中专的人不流动率最高，为 66.2%；向下跃迁率与受教育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向下跃迁率逐步降低，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向下跃迁率分别为 16.3%、13.5%、13.0% 和 7.6%，小学及以下者的向下跃迁率高出大专及以上学历者 1 倍以上。

未婚者的向上跃迁率为 21.3%，略低于已婚者的 24.0%；未婚者的不流动率为 74.2%，已婚者为 61.3%；未婚者的向下跃迁率为 4.5%，远低于已婚者的 14.7%。

只有在流入的城市获得稳定的、相较于流出地更好的工作机会，流动人口才可能在流入地居

表 1 两次流动时就业身份构成					%
第一次身份	本次身份				合计
	雇主	自营劳动者	雇员	未工作者	
雇主	2.2	0.2	0.2	0.3	2.9
自营劳动者	0.2	6.6	1.0	0.6	8.5
雇员	3.4	12.5	48.5	10.9	75.3
未工作者	0.7	1.9	4.8	6.0	13.3
合计	6.6	21.2	54.5	17.7	100.0

影响因素	身份跃迁方向（%）			样本数量 （个）
	向上	不变	向下	
合计	23.6	63.3	13.1	5943
户口性质				
农业	22.8	63.9	13.3	4916
非农业	27.4	60.6	12.1	1027
性别				
男	27.1	67.9	5.0	3286
女	19.2	57.7	23.1	2657
民族				
汉族	23.7	63.3	13.1	5741
其他民族	21.2	65.0	13.8	203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4.9	58.8	16.3	699
初中	23.9	62.6	13.5	3223
高中或中专	20.9	66.2	13.0	1428
大专及以上学历	26.5	65.9	7.6	593
婚姻状况				
未婚	21.3	74.2	4.5	926
已婚	24.0	61.3	14.7	5018
流动时间				
0~4 年	15.4	74.8	9.8	972
5~9 年	20.0	66.3	13.7	2131
10~14 年	25.5	60.3	14.2	1658
15 年及以上	33.9	52.8	13.3	1183
首次外出年龄				
14 岁及以下	29.5	54.0	16.5	237
15~19 岁	25.1	58.5	16.5	2339
20~24 岁	25.3	62.3	12.3	1717
25~29 岁	22.1	67.7	10.2	933
30 岁及以上	14.3	79.0	6.7	718

住停留较长的时间，而一旦无法在流入城市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或者最终无法得到一个向上流动的机会，流动人口往往选择返乡或投奔下一个城市。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向上跃迁率由 15.4%（流动时间在 0~4 年间）上升为 33.9%（流动时间在 15 年及以上），不流动率逐步下降，由 74.8%（流动时间在 0~4 年间）下降至 52.8%（流动时间在 15 年及以上），向下跃迁率先上升后保持稳定。不流动率随着流动时间的增加出现显著的下降，而向上跃迁率则明显提高。

首次流动时年龄越小，社会向上跃迁率越高，社会不流动率越低，不过社会向下跃迁率也较高。首次流动时年龄小于 15，向上跃迁率为 29.5%，不流动率为 54.0%，向下跃迁率为 16.5%，如果首次流动时年龄在 30 岁及以上时，向上跃迁率仅为 14.3%，不流动率为 79.0%，向下跃迁率为 6.7%。整个身份跃迁率构成的变化随着首次流动年龄的增加呈现出“喇叭形”的先窄后宽的形态。

首次流动期间，被调查人口平均有过 1.3 份工作，本次流动期间，被调查人口平均有过 1.1 份工作，显示出工作更换频率在下降。向上跃迁的人中，首次流动期间平均有过 1.1 份工作，本次流动期间有过 1.3 份工作，工作更换的频率在上升。

3. 身份跃迁的原因分析

通过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可以对各类影响因素在流动人口身份跃迁的过程中所起作用进行深入了解。本文选择了可能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跃迁的多个自变量进入回归模型，性别、民族、受教育水平、户口性质、婚姻状况、首次流动时年龄、外出流动时间、工作更换总频率（首次与本次流动期间工作份数之和）共 8 个变量。因变量为身份跃迁的三个方向：向上跃迁、不流动、向下跃迁，模型中以不流动作为参照类别。模型整体显著，似然率检验值为 932.919，Pseudo R-Square 值中，Cox and Snell 为 0.144，Nagelkerke 为 0.173，McFadden 为 0.087。最终模型预测准确率为 63.1%，其中对不流动预测的准确性较高，为 96.6%。模型结果详见表 3。

影响流动人口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依次是首次流动时年龄、外出流动时间、工作更换总频率、性别、户口性质和婚姻；影响流动人口向下跃迁的重要因素依次是性别、工作更换总频率、首次流动时年龄、婚姻和文化程度。民族因素排除在模型之外。

首次流动时年龄越大，越容易保持不流动，而不倾向于向上或向下跃迁，首次流动年龄每增加 1 岁，向上跃迁的概率降低 4.5%，向下跃迁的概率降低 7.9%。外出流动的时间的长短对向下跃迁影响不显著，对向上跃迁有显著影响。外出流动时间越长，越容易向上跃迁，外出流动的时间每增加 1 年，

表 3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参数估计

身份跃迁方向	变量	系数	Wald 值	显著性	Odd 值
向上跃迁	截距项	0.005	0.001	0.981	
	首次流动时年龄	-0.047	57.422	0.000	0.955
	外出流动时间	0.043	41.192	0.000	1.044
	工作更换总频率	-0.093	15.717	0.000	0.911
	婚姻：未婚	-0.281	7.234	0.007	0.755
	已婚	0.000			
	户口性质：农业	-0.281	8.655	0.003	0.755
	非农业	0.000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0.153	0.998	0.318	1.166
	初中	-0.033	0.072	0.788	0.967
	高中/中专	-0.237	3.602	0.058	0.789
	大专及以上学历	0.000			
	性别：男性	0.219	10.249	0.001	1.244
	女性	0.000			
向下跃迁	截距项	1.399	22.614	0.000	
	首次流动时年龄	-0.082	100.115	0.000	0.921
	外出流动时间	0.000	0.002	0.966	1.000
	工作更换总频率	-0.376	102.818	0.000	0.686
	婚姻：未婚	-1.566	73.287	0.000	0.209
	已婚	0.000			
	户口性质：农业	-0.140	1.179	0.278	0.869
	非农业	0.000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0.663	8.781	0.003	1.940
	初中	0.411	4.502	0.034	1.508
	高中/中专	0.536	7.624	0.006	1.709
	大专及以上学历	0.000			
	性别：男性	-1.420	205.487	0.000	0.242
	女性	0.000			

注：参照类别：不流动

向上跃迁的概率增加 4.4%。在控制首次流动时年龄、外出流动时间等影响因素之后，工作更换总频率越高，流动人口越容易保持不流动，两次流动期间工作过的总份数每增加 1 份，向上跃迁的概率降低 8.9%，向下跃迁的概率降低 31.4%。当婚姻状况处于未婚时，被调查者更容易保持不流动，未婚者相对于已婚者而言，向上跃迁的概率低 24.5%，向下跃迁的概率低 79.1%。户口性质对向下跃迁影响不显著，对向上跃迁有显著影响。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更容易保持在不流动状态，其向上跃迁的概率比非农业流动人口低 24.5%。受教育水平对向上跃迁影响不显著，对向下跃迁有显著影响。与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流动人口相比，其他受教育水平的流动人口更容易向下跃迁。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者向下跃迁的概率比大专及以上者高 94.0%，受教育水平为初中者向下跃迁的概率比大专及以上者高 50.8%，受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者向下跃迁的概率比大专及以上者高 70.9%。男性与女性相比，更容易向上跃迁，而不容易向下跃迁。男性向上跃迁的概率比女性高 24.4%，男性向下跃迁的概率比女性低 75.8%。

四、结论与讨论

当前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均处于一个转折期。在这一转折期，人们会根据经济利益优化的原则流向经济发达、机会众多的地区或城市，这仅仅完成了流动的第一步，只有给予他们均等的机会使其能够有希望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或层级流动，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流动，才能缓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焦虑和危机感，使国家平稳顺利地度过由于资源财富分配不公、制度设计不合理等不公平现象大量存在而导致的危险期。

本文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跃迁进行分析，得出一些主要发现。

1.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地位在上升，但“不流动”比例仍偏大

流动人口首次流动与本次流动中就业身份结构的变化反映出一种向上跃迁的态势，即雇主和自雇者比例有了明显上升，尤其是自雇者比例的上升显示了流动人口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一个活跃的位置。自雇者虽然占用资源较少，可利用的资本也多是自身积累或从亲朋借贷而来，但其有着其他经济成分所没有的灵活性与积极性，这一社会阶层比例的上升有利于整个社会体系的稳定，也有利于经济整体充满活力。雇员比例的减少同样显示了流动人口社会地位整体上升的趋势，在本文设定的四个群体中，雇员群体无论在首次流动中还是在本次流动中所占比例均最大，由于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中下层，该群体比例的减少有利于将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优化为“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但同时应该注意，四个群体中最底层未工作者群体比例有所增大，这使得“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增加了一个底座，变成一个“鱼雷”型结构，这种结构长期来看无异于对社会埋下不稳定的伏笔。

本文中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向上跃迁率要高于向下跃迁率，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但不能忽视的是“不流动”的比例仍然远远高于向上和向下的跃迁率，超过六成的人处于“不流动”状态。保持在高、中阶层的本阶层内“不流动”，属于高级形式的“不流动”，目前我国流动人口主要处于中、低阶层，保持在本阶层而“不流动”，则属于低级形式的“不流动”。本文数据显示，“不流动”的人中，超过 3/4 的人属于雇员群体，只有将这种低端“不流动”通过向上的身份跃迁加以改善，最后稳定到高端“不流动”状态，才能促进整个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2. 只有居留长久化，首次流动时年龄年轻化，向上跃迁的机会才更大

在城市中居留时间较长，就可能积累下更充裕的资本，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也更容易获得相关信息，这对流动人口的进一步向上跃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次流动时年龄越小，相对于年龄较大者可塑性越强，受过的教育也更高，就业竞争力更强。企业或单位也倾向于招纳或培养较年轻的流动人口。此外，较早流动进入城市，更容易接受城市的行为规则，思维方式与同龄的城市户籍人口更为接近，这些因素都可使首次流动时较为年轻的流动人口在向上跃迁时占有更多的优势。

3. 当前的户籍制度阻碍了身份跃迁

有研究表明,户籍人口的向上跃迁率高于流动人口^[5]。本文通过分析后发现,非农业流动人口的向上跃迁率要高于农业流动人口,根据模型中的 Odd 值可知,他们向上跃迁的相对概率同样要高于农业流动人口。说明无论从现实分布还是从未来改变的可能来看,农业流动人口的向上跃迁之路均难于非农业流动人口。这与我国当前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关联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化密不可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类型,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绝大多数只接受户籍人口就业,体制外劳动力市场虽然与户籍无关,但受人力资本分布的影响,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区,也就是说上升途径较好的岗位大多由来自城市的户籍人口或流动人口占据,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只能获得那些上升机会不多的岗位。只有打破当前的户籍制度安排,进而打破二元的劳动力市场,建设一个统一的、有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6],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4. 婚姻对女性往往意味着向下跃迁

婚姻可以改变人的社会地位,但在这一过程中,其对不同性别的人口作用有明显差异。男性无论在未婚时还是在已婚后向上跃迁率均高于女性,女性先天在身份跃迁方面处于劣势,婚后由于女性多从就业状态退回到家庭操持家务,个人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男性向上跃迁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女性向下跃迁的基础之上的,女性通过进入家庭,操持家务,免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女性的这种选择并非没有好处,她们可以通过丈夫的向上跃迁使得整个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进而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可是一旦丈夫向上跃迁的努力失败,女性则提前成为自身选择的牺牲品,因为女性的向下跃迁是大概率的,而其配偶向上跃迁只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

5. 教育在促进向上跃迁时作用并不明显,但却是阻止向下跃迁的“刹车闸”

与以往一些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本文通过分析,发现教育对流动人口的向上跃迁关系不大。除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表现出较高的向上跃迁率外,其他几种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呈现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向上跃迁率降低的负相关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受教育水平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外出时的年龄较小,在城市中居留的时间较长,获得的资源自然比受过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多,也更容易向上跃迁,但其向上跃迁的程度还比不上那些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其上升的潜力也没有后者大。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流动人口,在老家接受完高中或中专教育后外出流动,其本身并不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专业知识,人力资源水平比不上后者,而社会资源水平也比不上那些早出来几年的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或初中的流动人口,由于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不容易向上跃迁。此时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现象:受教育程度如果达不到一定水平,反而会越读书,越难以向上跃迁,而难以向上跃迁这一后果又会反过来影响流动人口本身或其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态度,导致其对教育作用的消极看法或态度,进而影响这一流动人口群体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面对这一矛盾,如果政府将我国当前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到初中,向上延长为从小学到高中,会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整体素质带来巨大的提升,也会促使当前身份跃迁模式发生有益的转变。

当前受教育水平虽然无法帮助流动人口向上跃迁,但却可以使其减少向下跃迁的可能。流动人口所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人力资本水平也越高,也就更能适应用工单位对其岗位的要求,进而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层内,这对稳定当前的社会结构起着战略性的作用。

6. 民族属性对身份跃迁影响不大

虽然汉族与其他民族的人口身份跃迁率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更可能是由于户籍、受教育程度、外出流动时间长短等因素造成的,与民族属性本身并无关系。回归模型没有将民族纳入模型内,这说明民族属性对流动人口向上或向下跃迁没有显著作用。但其他民族流动人口与汉族流动人口的向上跃迁率确实存在差距,只有通过提高受教育水平、改革户籍制度等综合措施才能使其缩小和改善。

(参考文献下转第 64 页)

十分了解流动人口的具体信息和多样化需求,通过这样的组织化的渠道,可以反映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从而增强服务管理的有效性。政府、社会组织、流动人口自组织三个主体密切配合,不仅能使服务和管理更具效率,有效地推进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管理,而且可以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在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较好的作用。

(4) 在资金保障方面,加大必要的资金投入,将事权和财权统一起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各项工作的开展,显然需要相应的经费投入,并确保一定的力度和持续性,这是流动人口长效管理的一个基本保障。在中央政府层面,应当按照统筹发展的原则,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财政支持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发展规划中,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由于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创造了社会财富,所以流入地政府应当在劳动保障、技能培训、子女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流动人口服务中保证一定比例的财政投入。在流入地不断推进的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中,基层社区作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落脚点,承担着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应对其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5) 在信息保障方面,需建立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及时准确地掌握流动人口信息,是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当前需要加快流动人口信息化建设,建立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体系,掌握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流向、区域分布、流动频率等基本信息,为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与合理分布提供动态可靠的数据支持。同时,应尽快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信息管理系统,即在纵向上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信息互享和责任互动的工作网络;在横向上不仅政府职能部门如统计、公安、劳动保障、卫生、人口计生之间进行有效的信息互通,而且在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部门之间保持定期交流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人口信息资源化,提高人口管理效率,而且可以为政府在服务管理方面的科学决策提供全面可靠的基础性资料。

参考文献:

- [1] 缪蒂生. 关于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思考 [J]. 江苏社会科学, 2008, (2).
- [2] 谭舒. 关于建立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框架的构想 [J]. 天府新论, 2011, (5).
- [3] 勾清明. 关于当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几个问题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1, (8).
- [4] 肖周燕, 郭开军, 尹德挺. 我国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机制及路径选择 [J]. 人口研究, 2009, (6).
- [5] 肖飞. 城市化加速期流动人口管理探略 [J]. 理论导刊, 2011, (12).
- [6] 苏杨, 肖周燕, 尹德挺. 中国流动人口管理报告 [M]. 北京: 企业管理出版社, 2010.
- [7] 伍先江. 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 [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11, (2).
- [8] 傅崇辉. 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回顾与思考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8, (5).
- [9] 章也微. 户籍地政府介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1, (7).
- [10] 朱少雄, 林昆勇, 赵铁. 试论我国流动人口综合管理和服务体系构建 [J]. 学术论坛, 2010, (12).

[责任编辑 冯 乐]

~~~~~  
(上接第 58 页)

#### 参考文献:

- [1] 程启军. 阶层间封闭性强化: 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新趋势 [J]. 学术交流, 2010, (1).
- [2]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38-41.
- [3] 王春光.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3, (4).
- [4] 李春玲.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 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 [J]. 社会学研究, 2006, (5).
- [5] 李春玲. 断裂与碎片: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12.
- [6] 田丰. 城市工人与农民工的收入差距研究 [J]. 社会学研究, 2010, (2).

[责任编辑 冯 乐]